

在历史的精确性和理论的简约性之间，揭示出『人民文学』与民族国家、民族文学的互动关系，以及在这种互动关系中所体现出来的新中国文学版图的显著特征。

民族文学的建构

袁向东 著

——以『人民文学』（1949—1966）为例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民族文学的建构

——以《人民文学》（1949—1966）为例

袁向东 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族文学的建构：以《人民文学》（1949—1966）为例/袁向东著.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5

ISBN 978 - 7 - 81135 - 964 - 0

I. ①民… II. ①袁… III. ①少数民族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1949—1966 IV. ①I207. 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74401 号

出版发行：暨南大学出版社

地 址：中国广州暨南大学

电 话：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 (邮购)

传 真：(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邮 编：510630

网 址：<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排 版：广州市天河星辰文化发展部照排中心

印 刷：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960mm 1/16

印 张：12

字 数：210 千

版 次：2011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11 年 5 月第 1 次

定 价：28.0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目 录

导 言 / 1

- 一 中国文学杂志的“文化基因” / 1
- 二 文学杂志研究的现状 / 3
- 三 《人民文学》的研究现状 / 7
- 四 研究目标及方法 / 9

第一章 民族文学与民族国家 / 11

- 一 被正名与释义的民族文学 / 11
- 二 民族：20世纪中国社会的核心话语 / 19
- 三 “让我们共同想象吧！” / 29

第二章 从新民启蒙到边疆经略的转换 / 43

- 一 从什么是文学到人民文学 / 46
- 二 新民启蒙与边疆经略的转换 / 55

第三章 《人民文学》建构民族文学的基本特征 / 66

- 一 建构愿望的相向性 / 66
- 二 建构过程的不平衡性 / 77
- 三 对民间文学的改写 / 80

第四章 蒙藏叙述 / 85

- 一 西藏故事 / 94
- 二 内蒙古叙述 / 104

第五章 民族图像 / 128

- 一 文学杂志的图像传统 / 129
- 二 人民文学的图像选择 / 132
- 三 民族的视觉表现 / 138

结 语 / 147

《人民文学》(1949—1966) 刊载民族文学作品辑录 / 151

参考文献 / 182

后 记 / 188

导　言

一、中国文学杂志的“文化基因”

1813年，龚自珍乡试未第，想到自己的“医国”良方无处可施，不觉悲从中来，填《金缕曲·癸酉秋出都述怀有赋》，“才也纵横，泪也纵横”^① 地对历史发出了一声长叹：“纵使文章惊海内，纸上苍生而已。”^② 90年后的1902年，亡命日本的梁启超创办《新民丛报》、《新小说》杂志，旨在播新民思想，倡政治小说，先以“维新吾国”、“维新吾民”为号召，^③ 继之以稿酬为诱惑，^④ 逐渐将读书人集合在“印刷文化”的聚光灯下，在政治的文学和文学的政治间纵横驰骋，于现实和想象之中你来我往，将“纸上”救苍生的喟叹掷给历史，把“新中国未来记”呈现于当下。梁启超显然是喜欢这种“纸上救苍生”的方式，于是他把办报章杂志当作事业来经营，“自是启超复专以宣传为业”^⑤，为此“每日属文以五千字为率”^⑥。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杂志使梁启超首先在个人生存状态上进而理解中国的方式上与龚自珍发生了“断裂”。更重要的是，在梁启超这位言论界骄子的带动下，读书人和出版商开始介入新兴的报章杂志事业，所以胡适才说“‘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时’，此二语惟梁氏可以当

① 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65页。

② 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65页。

③ 《新民丛报·本报告白》，见夏晓虹编：《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5页。

④ 《新小说》将“作文受谢”的润笔转化为现代的稿费制度。参见郭延礼：《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429页，第431页。

⑤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4页。

⑥ 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73页。

之无愧”^①。

《新民丛报》是以言说政论为主的半月刊，但也发表文学、美术等作品；《新小说》是小说杂志，但目的却在“新政治”。两本杂志的这种内容格局，既是梁启超这一代人救国保种欲望的体现，同时也暗合了西语中有关杂志一词“仓库”的词源本意。^② 发挥杂志这一救国工具的“仓库”特性，“抵挡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以挽救浩劫而拯生灵”^③，20世纪的中国文学就这样从作为储藏救国思想的“仓库”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仓库”里的思想不可能是单一的，“仓库”里的救国“物品”也不可能按照流水清单般井井有条地摆放着的。从杂志中生长出来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一开始就是博杂而又存在缝隙的。博杂是说从杂志生发出来的文学大而不纯，它和社会、政治、文化关系密切；缝隙是指这种文学里存有太多的话题交锋空间。

这种交锋很快就发生了，具体表现在当时学人对杂志的价值评价方面。对于借助仓库般的杂志去开辟文学的现代化道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欣然接受的。1905年3月，已发表了《红楼梦评论》的王国维撰写了《论近年学术》，文章批评时人在杂志上发表的文字所表现出的功利性，认为正是杂志妨碍了学术：“庚辛以还，各种杂志接踵而起。其执笔者，非喜事之学生则亡命之逋臣。此等杂志，本不知学问为何物，而但有政治上之目的。”王国维主张“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在这篇文章中他直接批评了梁启超发表在《新民丛报》上的关于康德的文章，指责“其纰缪十且八九也”^④。王国维的这种批评与其说是因学术而发，不如说是通过杂志的话题表达对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另一条道路的渴望。写于1906年的《文学小言》开篇里的一段话，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王国维批评杂志的深层原因：“若哲学家而以政治及社会之兴味为兴味，而不顾真理之如何，则又非真正之哲学……文学亦然，哺啜的文学，决非真正之文学也。”^⑤ 对于由杂志内容的功利性给读者带来的激动氛围，一些学者也表达了自己的担忧。1920年熊十力在给蔡元培的信中说：“今日优

① 胡适：《胡适留学日记》第1卷，（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22页。

② 余也鲁：《杂志编辑学》，（香港）海天书楼，1980年版，第26页。

③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点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④ 王国维：《王国维遗书》第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95页。

⑤ 王国维：《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4页。

秀之才，多从事于杂志，以东鳞西爪之学说鼓舞青年，对于精深之学术，不能澄思渺虑，为有系统之研究。默观今日之学生，每日除照例上课外，人人读杂志，人人做杂志。长此不改，将永远有绝学之忧。”^①

20世纪初形成的由文学杂志所表现出来的博杂而又充满缝隙的“文化基因”，或显或隐地影响着20世纪中国文学的成长，同时也为人们在20世纪末从文学史、思想史和文化批评等方面研究中国文学杂志拓宽了视野，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二、文学杂志研究的现状

从195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作为学科门类诞生之时起，文学杂志就进入了文学史家的学术视野。^②如所有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都会提到《新青年》、《小说月报》、《抗战文艺》等文学杂志，但在各种不同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多是把各种文学杂志当作一般的辅助性史料知识，用来说明选入文学史中的文学作品的出处，并不把文学杂志作为文学史基础性内容的叙述部分。^③在文学史家中，王瑶先生的见解显得独到而深邃。据陈平原回忆，王瑶先生从文学史的角度“再三强调”“现代文学之不同于古典文学，与其发表形式与生产流程大有关系”。或许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启发下，陈平原在1980年代完成的博士论文中就对“报刊生产过程以及报刊连载形式对于作家写作心态、小说结构和叙事方式的影响，已有较为切实的讨论”^④。

把文学杂志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且较大规模地从文学史、思想史、文化史的角度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是从1990年代开始的。中国现当

^① 《新潮》第2卷第4号，上海书店影印本，1986年版，第828页。

^② 如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下）对《新民丛报》的介绍，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第329页。朱栋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③ 如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言“《狂人日记》发表在1918年的《新青年》上”，作家出版社，1955年版。

^④ 陈平原：《文学报刊研究——以北大诸君的学术思路为中心》，《中华读书报》，2002年1月9日。

代文学研究领域在进行“重写文学史”^①、文学教学改革的讨论中^②，关注媒体、文化与权力关系的文化研究开始受到现当代文学研究者的重视，尤其是中青年学者为了开辟出自己的研究园地，更是积极借鉴，大胆引用。程光炜曾这样描述中青年学者对文化研究的态度：“为在本学科内获得更大的‘话语权’，文化研究自然是重新进入文学史的利器之一。”^③把文学史研究和研究者的生存状态联系起来，这种描述本身就充溢着“文化批评”的色彩。20世纪中国文学报章杂志本身的特性以及以往文学史对报章杂志的态度，使得文化批评研究者在文学报章杂志研究方面表现出了足够的热情。“进入199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界日益关注晚清以降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的紧密联系，相关论著也陆续涌现，且有成为新一波‘显学’的潜在优势。”^④从研究人员的多样性、研究对象的广泛性、研究方法的多元性来看，对文学报章杂志的研究确有成为“显学”之势。

首先，不同领域、不同专业、不同层次的研究者都表现出了对这个话题的极大兴趣和热情，研究人员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由各种研究者组成的队伍中不乏大学、研究所里的学者，同时也有新闻出版工作者，如黎之^⑤、涂光群^⑥等；有中文系的专门研究人员，也有新闻传播专业、历史专业的学者；有大学教授也有研究生。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研究生在对文学杂志的研究探讨中扮演着不可忽视的重要角色。近几年来，仅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中以文学杂志为研究对象的学位论文选题就有李宪瑜的《〈新青年〉杂志研究》、方迎九的《文学性与新闻性的消长——早期〈申报〉文人研究》、颜浩的《1920年代中后期北京的文人集团和舆论氛围——以〈语丝〉和〈现代评论〉为中心》、孙晓忠的《建国初期文学报刊体制的建立与文学生产的关系——以〈文艺报〉为中心》等。^⑦

其次，研究对象呈现出广泛性的特点。研究者的研究范围几乎覆盖了现当代文学史上所有重要的文学期刊，这一点在对现代文学杂志的研究中

① 1988年《上海文学》开设“重写文学史”专栏。

② 陈平原：《文学如何教育》，《文汇报》，2002年1月6日。

③ 程光炜：《大众媒介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④ 陈平原、山口守：《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新世界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⑤ 参见黎之《回忆与思考》系列文章，《新文学史料》，2000年第2期。

⑥ 涂光群：《五十年文坛亲历记》，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⑦ 陈平原：《文学的周边》，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118页。

表现得尤为突出。仅 2002 年《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发表的有关研究文学杂志的文章中，研究《新青年》的有陈平原《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新青年〉研究》，分上、下两篇，分别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 年第 3 期和 2003 年第 1 期；研究《新潮》、《国民》和《国故》的有：杨早《五四时期的北大学生刊物比较》，发表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 年第 2 期；研究《无轨列车》、《新文艺》、《现代》的有：葛飞《新感觉派小说与现代派诗歌的互动与共生——以〈无轨列车〉、〈新文艺〉与〈现代〉为中心》，发表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 年第 1 期；研究《小说月报》的有：丁晓原《诗意图语：〈小说月报〉散文的话语类型》，发表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 年第 4 期；等等。

最后，在研究方法上，研究者大多选择在现当代文学史上有影响的文学杂志为个案，运用从 1980 年代以来陆续引进的文艺社会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媒介研究、公共空间等理论和研究方法，对诸如文学生产与传播及其对作家的生存状态和文学观念、创作实践的影响^①，报章杂志对“新中国”的想象与叙述^②，文学制度的建构^③，编辑与创作^④，新媒体与创作^⑤等问题展开具体论述。

在众多的研究成果中，陈平原的文学杂志与文体变化之关系^⑥、李欧梵的报纸文学副刊与民族国家建设的关系^⑦、王晓明的文学格局设计^⑧等研究最引人注目。陈平原和李欧梵的研究分别代表了文学史研究和文化研究的研究指向，更具有方法论的意义。陈平原的研究思路是报章杂志—思想变革—文体演进，李欧梵则是报章杂志—文学—“公共空间”中的权利。

陈平原的研究认为“在文学创作中，报章等大众传媒不仅仅是工具，

① 参见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 1 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年版。

② 参见王中忱：《媒体·民族国家论述·“新小说”观念的诞生》，《越界与想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年版。

③ 参见孟繁华：《传媒与文化领导权》，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 年版。

④ 刘增杰：《试论茅盾系列文学期刊——中国现代文学期刊考察报告之一》，《文学评论》，2004 年第 4 期。

⑤ 欧阳友权：《网络文学论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年版。

⑥ 陈平原：《小说叙述模式的转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第 289 页。

⑦ 李欧梵：《“批评空间”的开创——从〈申报·自由谈〉谈起》，《现代性的追求》，三联书店，2000 年版。

⑧ 王晓明：《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上海文学》，1993 年第 4 期。

而是已深深嵌入写作者的思维与表达”，强调研究者通过报章杂志“触摸历史”。^①这种触摸是建立在对史料的占有、熟悉、旁征博引基础上的，如在《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一文中，作者除了运用研究对象《新青年》自身提供的资料外，还广泛引用了《新青年》的同人、对手、《新青年》所依托的北京大学以及后人对《新青年》研究所形成的“历史记忆”等资料。正是由于资料丰富，他才能进入历史语境，对研究对象给予“必要的理解与同情”，进而认为对《新青年》里的作品应“更关注其文学史意义，而不是文学价值”。不难看出，陈平原研究报章杂志的落脚点还是在文学史上，在《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一文中他“首先将《新青年》还原为‘一代名刊’，在此基础上，发掘其‘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所可能潜藏的历史价值及现实意义”。

李欧梵则更倾向于从“文化研究”的角度解读报章杂志，他曾这样表述其研究思路：“就拿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关系来说吧，它牵涉一个我怎么重新阅读文学史资料的问题，所以我很注重所谓的‘印刷文化’就是报章杂志。”^②他不像陈平原那样把史料导向文学史的研究，关注报章杂志对文体的影响或文学如何在思想史中获得发展动力。李欧梵所关心的是晚清报业“不再是朝廷法令或官场消息的传达工具，而逐渐演变成一种官场以外的‘社会’声音”。他研究的重点在于报章杂志上所表现出的这种“‘公共’声音是如何形成，用什么形式表现”的，他从报章杂志所刊发的文学作品中读出的是“新中国——一个新的民族群体的想象缔造”。^③顺便需要说明的是，李欧梵在做文化研究的同时，还通过中外文学经典的教学工作来发掘文学的意义。他的总体研究格局是将文学经典与报章杂志研究、都市研究“结合在一起”，^④文化研究只是他总体研究格局中的一部分。

① 陈平原：《文学报刊研究——以北大诸君的学术思路为中心》，《中华读书报》，2002年1月9日。

② 罗岗：《视觉文化读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③ 李欧梵：《“批评空间”的开创——从〈申报·自由谈〉谈起》，《现代性的追求》，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1页。

④ 罗岗：《视觉文化读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三、《人民文学》的研究现状

李欧梵在他的研究中描述了20世纪中国报章杂志从脱离官场到重新被纳入官场的过程。^①由于1950年代到1970年代的中国文学“一体化”^②的特征，使得这一时期的文学杂志不再具有现代文学杂志那样的多元性、丰富性特征。研究者所选择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被茅盾称为“中央刊物”^③的《文艺报》、《人民文学》上，其研究成果也不像现代文学杂志的研究成果那样多。在为数不多的研究成果中，洪子诚的研究成果比较突出，具有启发意义。他在《1956：百花时代》、《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两部专著中从“一体化”的角度分析了包括《人民文学》在内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学期刊，认为“当代文学对文学期刊的重视，不仅仅在于能及时地为作者提供刊发新作的场地，而且也是将全国的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加以集中、有序的管理，以建立有着统一路线的文学格局所必需的”^④。在李欧梵研究中所发现的由报章杂志所想象出的“国家”，在这里已变为由国家管理的文学了。

2003年，吴俊关于《人民文学》的研究计划获得教育部博士点课题基金资助，当时的《文艺报》报道了这条消息。吴俊在研究计划中确定的研究思路是：清理《人民文学》史料；在此基础上进行期刊专题研究，在当代文学史和文化研究的层面上，对《人民文学》及其文学和文化的代表性与典范性的多方面意义、价值进行综合研究。^⑤从2004年开始，吴俊陆续发表了一组以资料描述为主的关于《人民文学》的研究文章，主要有：《〈人民文学〉的创刊与复刊》（《南方文坛》2004年第6期）；《文艺整风学习运动（1951—1952）与〈人民文学〉》（《南方文坛》2006年第3期）

^① 李欧梵：《“批评空间”的开创——从〈申报·自由谈〉谈起》，《现代性的追求》，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2页。

^② 洪子诚对“一体化”问题有富有启发性的辨析。参见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88页。

^③ 茅盾：《茅盾全集》第2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5页。

^④ 洪子诚：《1956：百花时代》，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31页。

^⑤ 《文艺报》，2003年7月26日。

等。在《组稿：文学书写的无形之手》中，作者以注释的形式提出了“国家文学”的概念：“所谓国家文学，简言之就是由国家权力（包括其制度和意识形态等）全面支配的文学；同时，国家文学相应地也就成为国家权力表达或体现的一种自觉形态或方式。显而易见，当国家权力全面掌握了所有的文学资源、文学评判（标准）和文学可能性的最高乃至唯一的权力时，国家文学就必然成为文学的现实，文学就必然成为国家文学。”^①

吴俊对《人民文学》的研究尽管不断有成果发表，但他的研究也存在明显的不足，主要表现在用想象来弥补因为史料来源的单一性所造成的研究结论的不稳固性。从已发表的几篇研究成果看，他的史料主要来源于《人民文学》本身以及《人民文学》编辑涂光群的《五十年文坛亲历记》，而作为一种以发表创作作品为主的文学杂志，《人民文学》本身所能提供的可支撑他的研究话题的史料是非常有限的，根本就不具有自足自证性。于是作者在研究中对历史的想象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如在《组稿：文学书写的无形之手》一文中，他并没有注意到身为《人民文学》编委而主张停办《人民文学》的胡风在《三十万言书》和日记中关于《人民文学》组稿方面的言论资料，也没注意到丁玲等人对《人民文学》组稿意见的资料，致使在分析向胡风派作家组稿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权力斗争时，明显表现出想象的成分：“只有超越了周（扬）、胡（风）的权力及其之间利益关系的胡乔木，以其特殊的政治身份和政治地位，才能决定《人民文学》在组稿与发表上充满着人际权利角力的胜负结果。如果没有胡乔木的因素，那么，是否向‘胡风派’作家组稿或发表其作品，就将完全取决于周、胡之间的权利关系了。如此，结果肯定会是另一种样子了。本文对此还有另一种判断，胡乔木当时之所以‘力挺’‘胡风派’的作家，是否含有‘平衡’、‘制约’周扬权力（一统文坛）的政治策略用意呢？”

这里提到吴俊研究的不足，正说明当下对《人民文学》的研究就其研究程度而言，基本上还处于起步阶段，研究者多是把它作为“资料库”，虽然试图“以披露‘史料’的处理方式，将它们与文化研究的互动关系尽可能地呈现和展示”出来，^②但是由于研究成果的积累和研究者的切入点

① 吴俊：《组稿：文学书写的无形之手》，《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年第3期。

② 程光炜：《文化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学史研究的多样观察》，《文艺争鸣》，2005年第3期。

等原因，要想达到像陈平原等人研究《新青年》那样的研究深度，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而这正是我选择《人民文学》作为研究对象的起因。如何从整体上把握作为新中国文学“司令台”^①的《人民文学》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格局设计，进而梳理《人民文学》与中国文学发展的前因后果关系等，都是我应该面对的研究课题。

四、研究目标及方法

本书作者秉持学术探究与现实关怀相统一的基本理念，以 1949—1966 年出版的《人民文学》杂志为研究对象，运用历史学和美学的方法，借鉴人类学、民族学等相关理论，重点考察这一时段的《人民文学》在建构民族文学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基本特征。通过对《人民文学》的细读，梳理出《人民文学》建构民族文学的历史过程。在历史的精确性和理论的简约性之间，揭示《人民文学》与民族国家、民族文学的互动关系，以及在这种互动关系中所体现出来的新中国文学版图的显著特征。

本课题研究目标的提出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第一，《人民文学》具有时间跨度长、作品数量多的特点，以此为研究对象就必须选择合适的切入点。通过对《人民文学》刊载作品的研读，我发现，作为中国作协的机关刊物，《人民文学》从创刊之日起就把建构民族文学作为自己参与“新民主主义国家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因为它在《创刊词》中就已明确提出“开展国内各少数民族的文学运动，使新民主主义的内容与各少数民族的文学形式相结合，各民族互相交换经验，以促进新中国的多方面发展”^②。而对民族文学的建构势必又和建设民族国家、描绘文学版图等学术前沿话题发生关联。对这种关联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认识《人民文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对民族文学建构的作用。选择这样一个切入口进行研究是可以让人产生学术期待的。

第二，《人民文学》从 1949 年到 1966 年这 17 年当中，共出版了 198 期，其中发表民族文学作品 670 篇、民族题材的美术作品 34 幅。这些作品

① 丁玲：《为提高我们的思想性、战斗性而斗争》，《人民文学》，1952 年第 1 期。

② 茅盾：《〈人民文学〉发刊词》，《人民文学》创刊号。

本身的特征及其与《人民文学》杂志、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是值得探讨的。

第三，梁启超通过办杂志等，把中国的核心话题由“家族”扩大到了“民族”，认为“欧洲所以发达，世界所以进步，皆由民族主义（Nationalism）所磅礴冲击而成”^①。梁启超欲通过“新民”而使中华民族取得和西方民族平等的地位。《人民文学》建构民族文学则是对内整合民族认同，它关注的不再是“新民”的时间性问题，而是“疆界”的空间性问题。对这种变化的描述，正是本课题的研究意趣所在。

关于研究方法，我们强调历史学和美学方法的基础性，在这个原则之下发现新的学术领域，把握研究对象，提出研究问题，落实研究目的，在历史联系中将问题还原为历史过程。以《人民文学》作为研究对象，而它是以发表创作作品为主的文学杂志，因此，在对其研究之中自然不能忽略文学作品自身的美学因素。这对于已有的以“报告”式^②为主要特征的民族文学研究来说显得尤为重要。成功的研究案例告诉我们，在历史学、美学的方法指导下注重研究方法的多样性，是祛除遮蔽、敞亮问题的有效途径。《人民文学》杂志的形成与发展本身就是社会、政治、文学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提出的民族文学建构问题，也必然涉及文学之外的民族学、人类学领域。面对这样一个研究对象和所要解决的问题，运用多样化的研究方法，从不同侧面接近研究对象，就不仅仅是个策略问题了。一般说来，每种研究方法背后都有一个理论体系作支撑。这样一来，理论的简约性就成为我们必须注意的一个问题。陈平原在文学研究中所使用的“暗度陈仓”法，即将理论背景巧妙地融入行文叙述中，^③是值得借鉴的。

① 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文集点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48页。

② 参见姚新勇：《萎靡的当代民族文学批评》，《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年第8期。

③ 陈平原：《文学报刊研究——以北大诸君的学术思路为中心》，《中华读书报》，2002年1月9日。

第一章 民族文学与民族国家

运用民族、民族国家的理论，从政治共同体、历史文化共同体和想象共同体之间的关系来论述《人民文学》建构民族文学的社会文化背景。

一、被正名与释义的民族文学

“民族文学”，在现代汉语里又被称为少数民族文学、兄弟民族文学。从它的不断被正名和释义的过程来看，民族文学还是一个“未竟的工程”。关于什么是民族文学，对其内涵应作何种解释，相关的争论直到今天仍在进行。如仫佬族作家鬼子就不承认于文学之外还有所谓的民族文学。^① 姚新勇博士也认为因为宏观把握的缺失和微观批评的空泛，中国民族文学学科并没有建设起来。^② 但大多数学者认为民族文学及其学科是存在着的。如梁庭望先生就从研究、教育机构的设立，资料的整理和翻译，理论探索的成就等方面论述了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存在和发展。^③

对于民族文学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人们一般是从作家族属、作品题材、作品语言等方面进行界定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和中央民族大学相关学者的研究著作，多是以作家族属为依据来辨认民族文学。^④ 梁一儒先生则对少数民族文学的概念进行了更为严格的界定，认为少数民族文学是产生自某个民族，表达了这个民族特有的心理素质，为本民族所

^① 袁向东：《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会第八届年会综述》，《民族文学研究》，2004年第1期。

^② 姚新勇：《萎靡的当代民族文学批评》，《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年第8期。

^③ 梁庭望：《20世纪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南民族学院学报》（人文社科版），2001年第1期。

^④ 赵志忠：《民族文学论稿》，辽宁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喜闻乐见的文学。^①而杨义博士是从少数民族与汉族文化关系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的。^②总的来讲，从1990年代以来，学界逐渐把作家族属作为民族文学识别的标准。

文学史的实际情况总要比理论概括鲜活和复杂。《人民文学》在建构民族文学时，其理论思路和编辑实践是把汉族作家所写的少数民族题材的作品也算在内的。文学刊物的“发刊词”、“编后记”等文字旨在表明刊物编者的文学立场和编辑策略，是读者了解编者文学观念的重要窗口。《人民文学》的编者在其“发刊词”、“编后记”等文字中，将我们今天所说的民族文学具体表述为“少数民族文学”^③、“少数民族文学和有关少数民族文学”^④、“兄弟民族文学”^⑤。《人民文学》的这种观念和实践，一直坚持到1966年停刊之时，在这年第3期发表李沛生的西藏题材的小说《黑刺林》时，《人民文学》用“编者按”的形式呼吁“希望能读到更多的反映兄弟民族新的生活作品”^⑥。《人民文学》关于民族文学的这种观念和编辑实践，明显地和当下“标准”的民族文学术语产生了缝隙。为了使我们的研究对象在今天的语境下获得“合法性”，在这里有必要阐述我们研究对象的范围。

学界曾认为，有关民族文学的概念是在1958年提出的。^⑦其实，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协会早在1949年就提出了民族文学的概念，只不过那时将民族文学表述为“少数民族文学”。在1949年7月14日通过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和会章程》中，把“发展少数民族文学艺术运动”当作新中国文学艺术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作为全国文协机关刊物的《人民文学》，在1949年10月创刊号的“发刊词”中也明确提出民族文学建构的问题：“作为全国文协的机关刊物，本刊的编辑方针当然要遵循全国文协章程中所规定的我们集团的任务。这个任务就是：……开展国内各少数民

① 梁一儒：《文艺民族化论稿》，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00页。

② 杨义：《当代中国文学地图新页》，《今日民族》，2006年第3期。

③ 茅盾：《〈人民文学〉发刊词》，《人民文学》创刊号。

④ 《编后记》，《人民文学》，1952年第1期。

⑤ 《读者对本刊的意见》，《人民文学》，1956年第3期。

⑥ 《〈黑刺林〉编者按》，《人民文学》，1966年第3期。

⑦ 邓敏文、吕微等人的观点。见吕微：《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研究：国家学术与现代民族国家方案》，《民族文学研究》，2003年第4期。